

论“考古学文化”的学术意义

裴安平

(www.peianping.com)

自 19 世纪中叶西方考古学形成了“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以来，“考古学文化”就成为了世界范围内人们利用遗迹遗物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尤其是史前考古舍了“考古学文化”就没有其它具有一定时间一定空间范围的历史共同体了。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西方即欧美逐渐兴起了“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与研究。虽然这一理论完全与史前社会背道而驰，有违史前社会原本的形态与特点，并将现代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如“社区”、“社群”等引入史前考古，但它兴起的初衷和原因却显露了西方想要复原和研究历史可又缺少人类组织的载体与平台的空白和局限。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复原史前史和文明探源的学术高潮。为了尽快获得相应的成果，中国考古学一方面继续坚持以考古学文化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一方面又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力引进欧美的“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与方法，结果也显示中国的史前考古同样也缺少人类组织的载体与平台的空白和局限。

一、考古学文化对于复原和研究史前史的积极意义

一般而言，考古学文化就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一群有特色的遗迹遗物构成的共同体。

考古学文化的本质就是物质遗存的共同体，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物质遗存共同体；就像现在各地人们的生活习惯与语言有重要区别一样，一切都是自然的产物。

就世界考古学而言，考古学文化之所以会成为史前考古的主要对象和研究平台，有二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考古学文化具备时空二方面属性。

考古所发现的史前遗迹遗物都是文字出现以前的不会说话的历史遗存，要使这些历史遗存都转变成研究历史的资料就必须解决其时间与空间二个根本的属性问题，这是一切历史资料的基础和条件，而这二点也正是考古学文化在地层学、器物形态学支持下所具备的一大特点。正因此，具备了时间与空间的属性就成为了考古学文化再成为历史研究对象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考古学文化能够成为一种历史研究平台的根本原因。

第二，考古学文化使一盘散沙的历史遗物成为了一个系统有序的整体。

所有考古发现的对象都是物质的，虽然这些发现及其遗迹遗物都类似一个个历史的文字、单词或组织细胞，但是它们毕竟都是独立的，都永远无法相互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诚如人体一样，任何一个独立的细胞虽然都是人体的构成部分，但永远不是人。历史的研究也一样，个人的历史虽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永远也不是整体的人类及其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和考古学所研究的历史一直都是人类宏观整体的发展与历史，所以考古学文化的整体性就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人类历史的研究对象和平台。

相对世界考古学而言，中国考古学还自有二大利用考古学文化复原和研究史前史的正面的原因和理由。

第一，大量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是百年来中国考古的主要收获。

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现了大量史前与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这些发现与辨识不仅显示了中国史前与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与精彩纷呈，也同时显示了中国考古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与结果；更重要的是还让中国考古工作者发现所有中国的历史都隐藏在了考古学文化的背后，所有中国的历史都是考古学文化的历史。因此，坚持以考古学文化来复原和研究历史不仅充分肯定了考古人的追求和成绩，还同步充分显示了中国考古人对过往成就的念念不舍。

第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拉近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的距离。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苏秉琦先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中国考古学就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系统问题，从而竖起了中国学派的大旗；更重要的是还拉近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的距离，尤其是六大文化区系的划分大部都可与商周以后各地大型方国的出现及其地域范围基本对应的现象，让中国考古学界进一步意识到了考古学文化对于复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从此，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就是历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并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范围内由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各文化的区域特色还暗示了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¹。

显然，考古学文化对于复原和研究历史的积极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早期物质遗存本身时间、空间和整体性的研究，而且还与 20 世纪晚期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二、考古学文化对于复原和研究史前史的局限性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重建中国史前史与文明探源等重大课题的展开，将考古学文化当作历史研究对象与平台的局限性与问题已显露无遗。

第一，考古学文化的本质完全是物质的，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由一群有特色的遗迹遗物构成的共同体，就像现在各地不同的生活习俗一样，都是历史发展中的自然产物。虽然这种物质的共同体也连带反映了某些人类的历史与变化，但这些变化一方面并改变不了它的物质本性，另一方面这些反映也都是间接的都不是考古学文化直接造成的。

第二，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体是人，是人与人联合构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是复原并研究人的历史。虽然史前的人和组织都隐藏在了考古学遗迹遗物的背后，但这并不是考古学文化与人与人类组织可以相互替代的理由。人就是人，物就是物。物性的考古学文化永远都不会变成人，并主动去创造历史，也不会主动推动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历史必须“由物及人”，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社会组织为基本研究对象。千万不能用物态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替代了对人和人的社会组织的研究。

第三，考古学文化本身也是人类创造的，就像陶器的出现一样，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技术发展与进步的结果，而不是考古学文化自身进步的结果。正因此，

¹ 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2010 年 2 月 23 日。

要研究人类的历史与变化不可能从考古学文化中找到原因，而只能从人类历史的变化中找到考古学文化发展与演变的原因。

第四，考古学文化及其区系类型都是跨地域的范围广阔的地缘化的概念。但是，史前的人类组织不仅以血缘为基础，而且规模与分布地域都很小，远远不及考古学文化。因此，要复原史前社会，一方面不能用地缘的现象和特点来理解和复原血缘社会，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地将考古学文化的整体都当作一个统一的血缘社会组织。

第五，在史前人类的视野中，实际并没有“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也从来没有在“考古学文化”的旗帜下一起从事过农业、手工业，一起从事过文明和国家的起源。考古学文化对古人来说完全是身外之物。人们相互之间除了血缘与婚姻关系以外，谁都不会因为使用了相似的陶器和石器而成为“亲戚”或朋友。虽然它也是当时的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和共性，对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存在任何影响。今天，人们对考古学文化及其区系类型的认识，纯粹只是对一定时空范围内有一定共性的物质遗存的主观认识，一种纯地缘化的宏观的逻辑概括。

第六，虽然历史时期某些民族和国家的主体范围有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分区基本吻合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只是历史过程及其演变的最后结果，而且也与文明和国家起源毫无关系。事实上，中国的考古早已证明，国家的规模是不断扩大的，国家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史前古国的规模与地域范围都远远小于当地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如早期楚人的活动地域就很小，就只是“辟在荆山”；另一方面，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内可能就不止一个古国；再一方面，有的国家，如夏的主体范围实际就跨越了二个史前文化的分布地域，东南是河南龙山文化一部，西北是山西龙山文化一部²。

第七，虽然重建中国史前史与文明探源的工程都已经实施 20 年有余了；但是，无论史前史还是文明探源却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研究成果，至于文明起源 5 千年的结果也完全与事实不符，既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文明”，也没有说清楚“文明起源”有哪些标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与社会形态，聚落中哪个面积大哪个特别有物质遗存的内涵哪个就代表文明就是“王”，而周边的其他聚落就自然是“众星拱月”的“卫星”。这完全是以物的特点用形式逻辑来区别不同文化与区系类型的经典研究方法，结果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

结束语

今天之所以要分析和讨论考古学文化对于考古学的意义，并不是要否定它在复原历史研究历史中的积极作用，而是要理顺廓清它在复原历史和研究历史当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就对考古学文化及其研究情有独钟，甚至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范围内由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因此，只有真正廓清楚了“考古学文化”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并有助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的诞生与形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重建史前史与文明探源的实践早已表明中国考古

² 佟伟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张》，《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学已进入复原历史研究历史的新阶段。然而，复原历史研究历史仅靠考古学文化及其有关理论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历史遗物与历史之间，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考古学的理论是一个分层的体系，面对不同的问题要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来予以解决。最近，新出现的聚落群聚形态的理论就是专门研究史前社会组织与组织形态的理论³。这种理论与考古学文化理论的关系就不是要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和升级。其中，考古学文化仍旧是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基础，因为聚落群聚形态所研究资料的时间与空间属性都源自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果；而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则是升级，则是以人为本的研究。

因此，对复原历史研究历史的新理论与新思想采取拒绝和排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方法，不应该在学术舞台上再继续下去了。

³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